

马新主编

品读

王其俊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齐鲁文化
经典品读
appreciate
马新 主编

孟子



王其俊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品读/王其俊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 5

(齐鲁文化经典品读/马新主编)

ISBN 978-7-5607-5536-6

I. ①孟… II. ①王… III. ①儒家②《孟子》—通俗读物
IV. ①B222. 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8638 号

责任编辑 王立强

封面设计 张 荔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9.5 印张 33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本书系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齐鲁文化经典研究”
(N. 02540903)、山东省文化建设委托项目“齐鲁文化资源研究”
(N. 56480905)、齐鲁文化名家立项课题“走进齐鲁经典文化”
结项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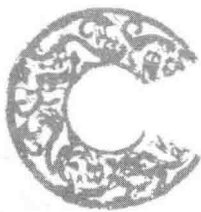
《齐鲁文化经典品读》 课题组

课题组负责人 马 新

课题组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新	马德青	王玉喜	王其俊
王爱清	巩宝平	刘厚琴	李吉东
李学娟	校 潇	郭 浩	郭海燕

总序



齐与鲁是西周时代分封的两个著名的诸侯国，因都在今山东省的范围内，所以，山东又被称作“齐鲁之邦”。我们习惯上所称的“齐鲁文化”也因此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齐鲁文化是指齐、鲁两国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广义的齐鲁文化则是指春秋战国时代兴盛于齐鲁之邦的所有文化的集合。无论哪一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都是传承与融合的结果，都是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的产物。

西周分封之前，山东地区西部是殷商重地，东部则是古老的东夷，被统称为“大东”^①。周公协助周成王分封天下时，将自己的长子伯禽分封到今山东曲阜一带，建鲁国；将姜太公分封到营丘一带，建齐国；将周文王的四个儿子分封到大东地区，分别建立了曹、邶、滕、邾诸国。另外，大东地区被周王朝分封或认可的诸侯国还有东夷建立的莒、莱等国，以及相传为黄帝后裔所建的薛、邳等国；夏王朝的余绪杞、郕、费。殷商遗国宋国的一部分也在大东地区。以上大大小小合计有六十多国。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列国的争战

^① 西周建国初年，为监视东方各诸侯国，实行分区经营。距镐京较近的各诸侯国统称“小东”，较远的各诸侯国统称“大东”。

兼并，山东地区的主要国家演化为齐、鲁、莒、邾、郯等国。南方大国楚、越两国也先后进入山东。越王句践灭吴后，曾迁都琅邪（古邑名，为春秋齐地，在今山东青岛黄岛区琅琊台西北），长期据有山东东南沿海一带；战国后期，赵国还据有今山东的西北地区，楚国则占有了山东中南部，一度出现了齐、鲁、楚、赵并立的局面。

列国的并立与重组实际上也是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交融。齐、鲁等国的统治者受封而来时，带来了周王朝的礼乐文化，随后便开始了周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融、与东夷文化的交融。比如，鲁国有众多的商奄之民以及殷民六族，殷文化底蕴十分丰厚，鲁国之社祭便是周社与亳社并存，亳社为殷人社稷之所。孔子即是殷人后代，他临终前曾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①又如，东夷之俗“好让不争”，“夷俗仁”，这一传统也被融入鲁文化中，成为儒家仁道思想的重要来源。正如王献唐先生所言：“孔子本是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的，又进一步发展为中心理论。”^②齐国之开国者太公到齐地后，其为政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③。齐为东夷故地，“因其俗”就是吸收、接纳东夷之俗，正因如此，才有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④的经济政策，也才有了“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⑤的思想特色。总之，周文化、殷商文化与东夷文化构成了齐鲁文化的三大基本来源。

春秋战国时代，周王朝分崩离析，诸侯割据，群雄逐鹿，兼并与融合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文化的交融与迸发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齐鲁之邦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它在西周以来的历史蕴积之上，兼收并蓄，吸纳了宋文化，莒、邾、薛文化，楚文化，越文化以及燕赵文化，等等，成为当时最为繁盛、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可以说，齐鲁文化是百家争鸣最为丰硕的成果。

春秋时期是百家争鸣的先声期，鲁有孔丘，齐有管仲、晏婴与孙武，而周王室与其他诸国，除老聃外，无可述焉。孔丘创立了儒家学派，有弟子三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其倡行“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其编修《诗》《书》《礼》《易》《春秋》，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与社会伦理思想更是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正统思想的基础。管仲是一位

① 《礼记·檀弓上》。

②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19页。

③ 《史记·齐太公世家》。

④ 《史记·齐太公世家》。

⑤ 《管子·牧民》。

成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的礼法并重、注重赏罚的政治思想是后世法家学派的重要源头，他的“通工商，官山海”的经济思想则是后世经济学家与改革家的重要依据，他关于仓廩与、食与荣辱与礼节关系的宏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的发展。其后同出于齐国的晏婴则是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和而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致力于俭约的治国理念以及智慧万千的外交作为，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晏婴之后的齐人孙武，继承了齐国开国之君太公以来的兵学传统与兵家文化，并在战争实践中升华、光大，成为中国历史上兵家文化第一人。

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鼎盛期，诸子学说纵横交织，层出不穷。此时的鲁国虽已没落，但文脉仍在，以其为中心，在邹、鲁、滕、宋、卫一带，形成了众星璀璨的思想文化圈。其中，孔子的后继者子思、孟轲等人形成的思孟学派推进着儒学的发展；出身于儒家的鲁人墨翟创立了墨家学派，提倡兼爱，倡导非攻，在认识论、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上都有重要发现，对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吴起早年便到鲁国学习儒学并出仕为武将，后成为战国前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参与了魏文侯的变法，主持了楚国的变法，对法家思想和兵学文化都有显著影响。宋国蒙（今山东东明一带）人庄周是战国道家的代表人物，认为道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对中国古代思想与社会影响深远。在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圈中，还曾活跃着编撰《春秋左氏传》的鲁人左丘明，远道而至滕国的农家创始人许行及其追随者，工匠之祖师鲁国的公输般（即鲁班，“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等等。

此时的齐国为战国七雄之一，其官办的稷下学宫是当时无有匹敌的思想文化中心，存续长达一百四五十年。盛时的稷下学宫有学士数百，被赐为上大夫者一度达七十六人，同时代的战国诸子几乎被其网罗殆尽。其中较为著名者，有战国法家三大学派之一的田齐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有道家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田骈、彭蒙、宋钘；还有儒家孙氏之儒的代表人物荀卿，他主张礼法并用，“隆礼重法”，倡导“法后王”与社会变革，对后世的儒家和法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两位高足李斯与韩非子成为战国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名家的代表人物尹文，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杂家的代表人物淳于髡等也是学宫之中的佼佼者；而兵学家孙武之后孙臆，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军事谋略家，指挥了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等著名战役，为兵家文化之重要代表人物；齐人扁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是中国古代医学文化的代表人物；齐人甘德精于天文历算，与石申合著之《甘石星经》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代表性著作，等等。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形成并繁荣的齐鲁文化，名家荟萃，洋洋大观，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一部齐鲁文化史就是一部精编版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史，齐鲁文化中的传世经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千百年来对这些经典的诠释汗牛充栋，直到今天，这些经典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品读价值，值得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再加品读，以更好地感受齐鲁文化之韵，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之魂。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代久远，齐鲁诸子的著述或散佚，或残缺，我们只能从传世至今的完璧中，选择能够代表诸子本人思想学说者，纳入这套“齐鲁文化经典品读”，计有《论语品读》《管子品读》《晏子春秋品读》《孙子兵法品读》《孙膑兵法品读》《墨子品读》《孟子品读》《荀子品读》《庄子品读》，共八种。

既是品读，就要在充分吸收以往齐鲁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往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古籍整理模式，以当代文化的视角重新梳理齐鲁文化经典，以当代社会的文化符号系统重新解读齐鲁文化经典，突出当代文化的实际需求，拉近社会大众与经典文化的距离，使广大读者能够轻松自由地走进齐鲁文化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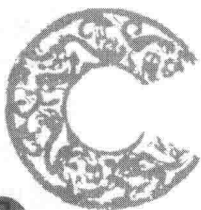
从结构上讲，丛书中的每一种书都包括了“人物与文化研究”“原著注释与品读”两大部分内容。在“人物与文化研究”中，旨在实现两个沟通：一是读者与古人的沟通。将人物置于其存在的文化背景中，发掘其文化内涵，寻找其核心精神，找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历史人物，而不是拘泥于常规的历史人物小传，以便于读者对其了解与认知。二是古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沟通。着力寻找历史人物与相关文化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以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原著“品读”中，我们力图改变以往古籍类著作注释加翻译的习惯，把主动权交给读者，让读者直接与古人对话，直接亲近经典，自觉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重点在疏与解上下功夫，通过恰当的疏与解，引导与帮助读者阅读，而不是越俎代庖。总之，通过对人物与文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原著；通过对原著的解读，可以更好地认识与吸纳优秀传统文化。

这套“齐鲁文化经典品读”丛书，是我们的新尝试，更是我们向齐鲁文化经典的致敬。错谬不足之处，尚请大方之家不吝赐正。

是为序。

马 新

2015年12月于山东大学高阁书斋



孟子

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儒家大师，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更是齐鲁文化的重要代表。孟子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将孟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尊称其“亚圣”。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前 372 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 289 年），终年八十四岁。

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赵岐《孟子题辞》、韩婴《韩诗外传》、刘向《列女传》等书记载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杀豚不欺子”等故事和传说，大体反映了孟子少年时代的家庭状况。“孟母三迁”讲的是：孟子幼年时，家邻近坟地，经常有人前来埋葬、祭奠死者。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孟子常模仿成人做丧葬的游戏。孟母担心这种环境对孟子幼小的心灵产生不利的影响，于是将家迁往集市附近。但是，集市上终日人来人往，商人高声叫

卖，孟子耳濡目染，又模仿商人兜售叫卖。孟母于是又将家迁往学宫附近，从此定居下来。学宫中聚集了很多懂礼仪、有学问的读书人。孟子在这种良好环境的熏陶下开始学习礼仪，孟母非常高兴。“断机教子”讲的是：孟子幼年读书，开始时常贪玩而不用功。有一次，孟母正在织布，恰好孟子蹦蹦跳跳地从学堂回来。孟母询问孟子近来学习怎么样，孟子回答说跟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孟母听了这话，又生气又伤心，操起剪刀把布机上刚织好的布从中间剪断，并教育孟子说：“你不用心学习，荒废学业，就像我剪断机上的布一样。你用功学习，增长知识，才能学到本领。”从此以后，孟子牢记母亲的话，早起晚睡，刻苦学习。“杀豚不欺子”讲的是：当孟子一家还在集市旁居住时，有一天，孟子看到邻家杀猪，便不解地问母亲：“邻家为何杀猪？”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答道：“煮肉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待孟母反应过来，深知做人要诚实，于是，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尽管当时家中非常贫苦，她仍然到邻家买了块猪肉给儿子吃。虽然上述故事是传说，但它们大体反映了孟子幼年家贫和受到母亲良好教育的状况。

孔子所在的鲁国崇尚信义，重视礼教。孟子所居的邹国与鲁国相连。孟子幼年就受到鲁国礼教、风俗和孔子事迹的熏陶。约十五岁时，孟子怀着对孔子的仰慕之情，前往鲁国求学，私淑子思的学生。经过刻苦学习，他后来逐渐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学者和儒家大师，为其后来游说诸国打下了基础。

孟子四十岁左右时，主要在邹、鲁一带从事讲学，广招学生，宣传孔子的仁德学说，影响日渐扩大。邹穆公听到孟子的贤名，于是任他为士。不久，邹国与鲁国发生武装冲突，邹国的官吏战死三十三人，百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长官被杀也不去救援。邹穆公十分恼火，于是抱怨百姓。孟子批评邹穆公不实行仁政，结果才遭到了百姓的报复。孟子在邹国为士时，父亲去世，便实行三鼎之礼，守丧三年。邹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在当时的形势下难以完成以仁政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孟子为了实现济世救民、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在公元前329年，率领学生首次出行游说北方实力强盛的齐国。

齐国是一个依山傍海、膏壤千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实力强盛的诸侯大国。齐威王为了实现称霸诸侯、统一天下的愿望，在稷下学宫召集了大批贤士。孟子至齐后，被任命为充当顾问的稷下大夫。他曾与匡章交游，劝说齐王打开棠地粮仓救济百姓。公元前326年，孟母去世。孟子怀着悲痛的心情护送母亲的灵柩回鲁国安葬，实行五鼎之礼，守丧三年。公元前323年，孟子返回齐国。

孟子在齐国积极向齐王宣传仁政主张，希望通过齐王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齐威王一心想振兴齐恒公的霸业，始终没有采纳孟子以德服人、获得民心的政治主张。公元前323年，孟子拒绝接受齐王所赠上等铜币一百镒，率领学生离开齐国。

孟子听说宋国将实行仁政，便风尘仆仆前往宋国。当时，宋君为幼主，左右贤臣不多。孟子曾以幼子学语为喻，告诫宋臣戴不胜应多向宋君推举贤才，仅凭少数人的力量推行仁政是不行的。有一次，宋大夫戴盈之对孟子说：遵照您的意见，我们想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免除关卡、市场上的捐税，但今年不能实行，暂时减轻一些，明年再完全实行。孟子以“攘邻之鸡”为喻，批评了戴盈之的错误。

孟子在宋国时，滕文公曾作为太子出使楚国，他在往返途中经过宋国，两次会见了孟子。孟子向他讲了许多关于仁政的道理。由于宋国君主对实行仁政缺乏果断措施，孟子于公元前322年接受赠金七十镒，离开宋国，途中经过薛国，返回邹国。

这一年，鲁平公即位，打算让孟子的学生乐正子主持国政。大概经过乐正子的引荐，鲁平公想会见孟子。但由于嬖人臧仓的阻挠，孟子在鲁未能与鲁平公相见，于是返回邹国。

公元前322年，滕定公死。滕太子两次派然友前往邹国向孟子请教丧葬之礼。孟子主张实行三年之丧。后来，受滕文公的聘请，孟子前往滕国。孟子在滕期间，多次与滕文公问答，较系统地阐述了重视农事、赋税有制、加强教化等仁政主张，向毕战阐述了井田制；批驳了许行否认社会分工的主张，全面地阐述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论和产品交换论。孟子的仁政主张虽被滕文公所采用，但滕是个处于齐、楚两大强国中间的弱小国家，面临着被大国并吞的危险。孟子对滕国是事齐还是事楚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感到无能为力。为了实现以仁政“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公元前320年，孟子不远千里，前往招纳贤士的魏国。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多次交谈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诱问，或譬喻，既严厉、巧妙地批评了梁惠王不行仁政、祸害百姓的错误，又阐述了君仁臣义、君民同乐、不违农时、发展生产、省刑薄敛、加强教化的仁政主张。孟子在魏国时，曾批驳景春赞扬公孙衍、张仪是大丈夫的言论，与淳于髡辩论灵活权变，与白圭论治水和二十抽一的税法，等等。孟子在魏虽受到梁惠王的礼遇，但其仁政主张始终未被采用，他曾气愤地抨击梁惠王是不仁之君。公元前319年，梁惠王去世。第二年，梁襄王继位。孟子认为梁襄王是一个无所作为之君，便于这一年离开魏国，前往齐国。

孟子至齐时，正值齐宣王初年，他对齐王实行仁政充满了信心。《孟子》

一书中对孟子与齐宣王的交谈记载最多。孟子在与齐宣王的交往中，侃侃而谈，有时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有时引用《诗》《书》等古籍，有时引用圣贤言论和事迹，有时设类比和譬喻，有时运用诘难和归谬，有时循循善诱阐述仁政，有时义正词严批驳谬误，较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君仁臣义、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诛杀暴君、民贵君轻、以民为本、以民为宝、制民之产、发展生产、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兴办学校、加强教化、获得民心、统一天下等仁政理论。这既是孟子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其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孟子的仁政主张曾使齐宣王受到一定鼓舞。但齐宣王毕竟是急功近利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当权者，他骄奢淫逸，喜好财货、美色而不恤民苦，极力想用武力并吞别国、称霸诸侯，从而与主张仁政、王道的孟子分歧日益增大。公元前314年的齐伐燕事件，加剧了孟子与齐宣王的分歧与冲突。齐伐燕失败后，齐宣王感到很对不起孟子，便亲自前来看望他。后来又通过时子挽留孟子，准备给孟子在都城中建一所房子，并给予万钟的俸禄，让他留在齐国讲学。孟子认为自己游齐的目的是行道和济世救民，而不是贪图富贵利禄，便谢绝齐宣王的挽留，于公元前312年离齐归邹。

孟子结束了近二十年的游说生涯，晚年在邹聚徒讲学和著述，与公孙丑、万章等弟子撰述《孟子》七篇，终老于邹。

《孟子》一书主要是孟子本人所作，其中也有万章、公孙丑等人的记述。《孟子》原文七篇并无上、下卷之分，亦无章次之别。东汉赵岐为《孟子》作注时，将各篇划分为上、下卷，每卷分若干章。七篇的顺序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全书总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余字。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是明代姚士舜伪撰。对《孟子》的注释著作甚多，较优的有赵岐《孟子注》、朱熹《孟子集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焦循《孟子正义》，以及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二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著名历史人物及其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孟子思想的产生，与战国中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社会状况是紧密相连的。

战国中期，各大诸侯国经过变法和改革，基本确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大一统的任务逐步被提上日程。各大国统治者为了扩大疆域，称霸诸侯，彼此兼并，掠夺土地、人口和财富，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统一政权的产生。但连年的战争和统治者的压迫剥削，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

一大批有远见的思想家为实现封建统一、结束兼并而奔走呼号。孟子怀着对百姓苦难的深深同情和济世救民、以仁政统一天下的政治抱负，游说诸侯，宣传仁政，抨击时弊，揭露暴政，提出结束兼并、实现统一的主张，追求政治清明、天下统一、君仁臣义、君民同乐、民风淳朴、道德高尚的美好理想社会。这样，战国中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就是孟子思想产生的政治根源。

战国时代，广大劳动者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这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并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封建国家和地主占据了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因而在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占有农民的部分劳动成果。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艰苦劳动促进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实行分工交换，种谷植桑，饲养家畜，减轻赋税，就是以一家一户个体小生产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为蓝图。因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孟子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

在诸侯割据、群雄并峙的形势下，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尚不平衡，封建国家统一的社会意识还未形成。各诸侯国在思想上鼓励论争，兼收并蓄，以便从众多的学术理论中寻觅“治国、平天下”之道，从而促进了战国士阶层的崛起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战国时代，士阶层日益活跃起来。他们有的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有的游历诸侯国，辩其谈说；有的辅佐朝政，参与政事；有的长于权变，纵横捭阖。他们往往博古通今，经世致用，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突出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从总体上看，多数士人以知识、才能、人格、道德活跃于社会舞台，表现了士人的坚定志向、崇高气节和独立自主人格，这就给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输入了较强的竞争机制。同时，各国统治者竞相招纳贤士，实行对士阶层的开放政策，为士阶层的崛起和百家争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在百家争鸣中，参与争鸣的诸子几乎遍布各诸侯国。他们评古论今，贯通天人，阐述哲理，经世致用，涉及个体、社会、天人等若干方面，既陈述己见，自成一说，又互相诘辩，相互吸收，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孟子以学习孔子为志向，以捍卫儒家学说和“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新兴地主阶级士阶层的突出代表。他的思想是在与墨家、法家、道家、农家等学派的辩难、论争和相互吸收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怀着“治国、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弘扬仁义，宣传仁政，同情民苦，抨击暴政，志在济世救民，兼善天下，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他在抨击暴政的同时，又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力谏诸侯借鉴三代天下得失的经验教训，摈弃霸道，实行仁政，制民之产，发展经济，减

轻刑罚，薄收赋税，尊贤使能，加强修养，改过从善，进而获得民心，统一天下。他以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深邃洞察力和理性批判精神，揭露、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对立和各种弊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人所未及的。这既在广阔的层面上揭示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又顺应了封建统一的社会发展趋势。

孟子在长期的政治、学术活动中，崇尚仁义，坚守信念，刚直不阿，藐视权贵，强调士人无论在身居穷困之时，还是在通达显赫之时，都要坚持仁义节操和不可屈服的独立自主人格，不为富贵所淫、贫贱所移、威武所屈。他所强调的士的志向、节操、尊严，完全压倒了对富贵利禄的追求和满足，既表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对高尚人格和道德境界的孜孜追求，又表现了他们坚持理想，不苟合取容的傲岸性格和风骨。

三

从孟子思想的内在联系来看，孟子论述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极力追求个体完善、社会协调和天人和諧。孟子思想是由个体论、社会论、天人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整体。

个体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它包括个体的发展、个体的需要、个体的本性、个体的价值等方面。

在孟子那里，个体是指既有饮食、男女的自然属性，又有与“犬马”不同的社会属性、道德观念和理性思维活动的人。他将个体的发展划分为幼年、成年、老年三个阶段，认为人的形体构造是一个包括耳、目、鼻、口等感官和心官的和谐统一的整体。个体的发展受家庭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力行践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个体的需要上，人具有饮食、男女的自然生理需要，人际交往的需要和追求理义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在这些需要中，要以高级需要制约低级需要，以心官制约感官，以天爵制约人爵，不断协调各种需要之间的关系，以保持自身需要及人与人之间需要的和谐。在个体的本性和价值上，孟子从“人禽之辨”立论，认为人具有善的本性，它包括四心、四端、四德三个相连的层次，深化了对人本性的认识；孟子坚持以仁义为核心的个体价值观，认为理义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和声色臭味、富贵利禄的物质价值，既主张生命价值、物质价值、交往价值、精神价值的多样性的协调统一，又主张坚持节操、独善其身的内在价值与济世救民、兼善天下的外在价值的统一。

社会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它包括家庭观、国与天下

观、社会约制和社会变迁。

在家庭观中,孟子阐述了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妇关系,论述了家庭生养繁衍后代的自然生育功能、赡养父母和畜养妻室儿女的经济功能、尊亲敬长的教育功能、以血缘和婚姻情感维系家庭人际关系的情感功能,将家庭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在国与天下观上,孟子主张诸侯要实行仁政,获得民心,进而实现天下统一。他将土地、人民、政事视为国与天下的三个根本要素,强调建立君仁臣义、各尽其道的君臣关系和上行下效、君民同忧同乐的君民关系,提出了“民贵君轻”、得到百姓拥护就能成为天子和“诛一夫纣”的政治卓见。在社会约制上,孟子主张实行下服从上、任贤使能、罢免不肖、惩罚犯罪的政治约制;实行社会分工、产品交换、制民之产、薄取赋税、抚恤百姓等经济约制;实行以尧舜之道、善良习俗、道德教化等手段促进社会成员自觉居仁由义的思想意识约制。在社会变迁上,孟子考察了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变化,探讨了社会变迁的原因,阐述了社会变迁的方式,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著名命题。

天人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它包括天人的构成要素、天人的和谐及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三个方面。

在天人构成要素上,孟子认为天包括自然之天、社会发展趋势之天和伦理之天。在自然之天上,孟子用自然之天表示自然万物存在的自然性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在社会发展趋势之天上,孟子既用天、命表示社会发展的一定必然性,又用其表示社会发展过程中某种时间上的偶然性。在伦理之天上,孟子认为天是人的善性存在的自然性及其向善发展的必然性。伦理之天,一是指人生命的寿夭长短,二是指仁义礼智对自然欲望、富贵利禄的制约。此外,孟子在引用《诗》《书》时,还保留了意志之天的含义,仍受到传统天命观的一定影响。在天人和谐上,孟子主张人与天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上的协调统一,强调人顺从自然规律,就能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而使五谷、鱼鳖、材木享用不尽;主张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实行仁政,获得民心,就能实现国治、天下平;主张追求天人协调的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以古代圣贤为楷模,经过深造自得、反省自身、力行践履、艰苦磨炼和正义的经常积累,培养出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达到与天地同时运转的圣、神道德理想境界。在天人协调的认识论上,孟子通过对天人范畴的考察,将天作为人认识、体察、反映的对象,区分了耳目感官与心官的不同职能,认为耳目感官接触外物能获得感性认识,心官能认识自然、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本性从而获得理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感官是心

齐鲁文化经典品读
孟子品读

官的基础,心官对感官具有指导、制约作用,感官如不接受心官的制约,就会被外物所蒙蔽。孟子较全面地论述了心能知物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及人之本性的重要作用,深化了古代人们对心的认识。在知行关系上,孟子主张由行而知,反对实行了而不知其当然,习惯了而不知其所以然,终身实行了而不明白其根本道理的倾向,认为知不是被动的,而是能指导、促进进行,坚持了知与行的统一。在先秦儒学发展史上,孟子坚持了既重视感性认识,又强调理性思维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

孟子将个体论、社会论、天人论视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三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就是说,个体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和谐又是天人和諧的基础;天人和諧促进、影响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又促进、影响个体和谐。总之,孟子思想体系是一个包括多等级、多侧面的有机整体,显示出一定的多样性、有序性和开放性。^① 孟子从整体上探讨了个体、社会、天人的联系、发展和变化,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观和系统观,在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②

四

孟子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他的散文创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与早期语录体的《论语》相比,《孟子》中的若干篇章,从立论、论证到结论,显示出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说理透彻、论证周密和具有整体性构思的特色,是在语录体基础上由章到篇的重大发展。从《孟子》一书的文章风格来看,该书文字一体,笔势一贯,记载了孟子数十年的言论、事迹,综述了几十人的问答,文字流畅,犀利精练,气势磅礴,感情充沛,宽厚宏博,驰骋自如。其中,较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许行”章等,在先秦文学史上是由章到篇的划时代的作品。

我们可从《孟子》一书中看到孟子与众不同的性格、气质、价值取向及超人的文学才华。

《孟子》一书描述、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刻画得最为丰满而有立体感的是孟子本人。它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了孟子的性格、气质和价值取向等。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崇尚仁义,坚守信念。孟子将仁义视为尧舜之道的根本,既把仁义当作调整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又把它当

^① 参见王其俊:《孟子思想体系新论》,(台湾)《孔孟学报》第68期。

^② 参见王其俊:《亚圣智慧——孟子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